

以案说法

以此为戒

养老院里，
九旬老人被另一名九旬老人殴打致死
这起生命权纠纷怎么判

通讯员 顾洁苗 张茹颖 本报记者 高敏

老人在养老院自己的房间里，被同室老人用拐杖殴打致死，事发后打人的老人也患病去世。那么，谁该对被打老人的离世负赔偿责任？近日，仙居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生命权纠纷案。

90多岁的张大爷生活无法自理，2018年，儿孙们将他送到仙居某养老院托养、护理，还隔三差五去探望。

然而，2019年7月的一个中午，张大爷在养老院的房间内遭遇同室的秦大爷的殴打，被发现后送往医院，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秦大爷也已91岁，刚入住养老院一个星期。当天，他拿起其他老人留在房内的拐杖无故殴打张大爷。经公安机关鉴定，秦大爷患血管性痴呆，属无刑事责任能力。事情过了没多久，秦大爷也患病去世。

此后，张大爷的家属将秦大爷的子女及养老院告到法院，认为秦大爷的故意伤害行为和养老院疏于管理、严重失职是导致张大爷死亡的直接原因，要求两方赔偿经济损失40余万元。

秦大爷的子女表示，他们虽然对父亲具有赡养义务，但并非张大爷死亡的直接侵权人，而且父亲已经托养给养老院，他们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养老院作为提供有偿服务的专业养老机构，事发一段时间后才有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如果能及时发现制止，张大爷就可能不会死亡，这属于养老院的管理疏漏，故应由养老院承担赔偿责任。

但养老院认为，他们日常管理中有护工定时巡查、视频监控等，事发当天也在第一时间报警、叫救护车，已尽到全部注意义务。而且，秦大爷入住时，双方签订了“乙方在院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等所造成的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的豁免条款。张大爷的死亡结果是

秦大爷的加害行为所致，养老院并非共同加害行为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虽然秦大爷的民事行为能力未经鉴定，但综合公安机关鉴定及现有证据，可以认定秦大爷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秦大爷的子女是其监护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监护人对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责任是法定责任。也就是说，只要被监护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监护人就应承担民事责任，不论监护人是否有过错。因此，本案中秦大爷在养老院托养并不能免除其子女的监护责任。秦大爷的加害行为是张大爷死亡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该责任由其具有监护能力的成年子女承担。

从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证实，秦大爷打人所使用的拐杖是其他老人遗留在房内的，养老院作为管理人，对可能具有一定危害性的拐杖没有尽到及时清理义务。在张大爷基本丧失自理能力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与其身体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护理措施，在张大爷被打伤间隔时间较长后才发现，最终导致其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因此，养老院没有完全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对张大爷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次要赔偿责任。

最终，在法院、乡镇街道、民政部门等共同组织调解下，原被告达成调解协议：由秦大爷子女赔偿张大爷家属12.3万元，养老院在已垫付的3000元医药费外再赔偿6.7万元。

法官提醒：

养老机构要提高管理能力，重视对老人入住前的健康检查，保护好养老人员的合法权益。同时，子女将老人送到养老院并不是“一劳永逸”，不能隐瞒老人的健康状况，更要常去看望老人，履行好监护责任，让老人安度晚年。

案例警示

许女士找单女士代班 单女士又找张女士代班
顶岗的张女士摔倒受伤，谁来赔偿损失？

见习记者 杨思思 通讯员 茅启伟

日常工作中，找朋友代班并不少见，可如果代班的人又找了“临时代班”，还在顶岗时发生意外受伤，这里面的责任该怎么划分？

许女士是慈溪市某公司食堂工作人员，平日里与在某学校食堂工作的单女士关系较好。疫情防控期间，学校食堂未营业，单女士闲赋在家。今年3月，许女士因身体原因需要休息，便找单女士帮忙代班一段时间。这期间的一天，单女士因为家中有急事，又找了原来同在学校食堂工作的张女士做“临时代班”。哪料到，张女士在代班当天，不慎在公司食堂摔倒导致尾椎骨折。

意外发生后，承包该公司食堂的负责人承担了张女士全部治疗费用，许女士、单女士也都前去看望，并给予张女士一定的慰问金。

伤势好转后，张女士向食堂承包方、单女士提出“要求赔偿自己受伤期间的伤残赔偿金、营养费、误工费、看护费等费用”。

食堂承包方认为，张女士并非自己公司员工，他们没有明确表示同意邀请张女士过来帮忙。意外发生后，食堂已经赔付了张女士所有的医疗费，其他费用不应再由食堂承担。

单女士则认为，虽然自己邀请张女士帮忙，但自己已经上门慰问，何况张女士受伤和她自己也有关系。

由于赔偿金额谈不拢，张女士找到了庵东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寻求帮助。

调解员通过电话询问、走访事发地等方式，发现食堂存在管理过失，对代班行为并未提出异议；许女士没有及时了解单女士的工作情况；单



图源网络

女士私自邀请张女士代班并没有及时告诉食堂方、许女士；张女士明知去食堂代班，根据自己对原有职业的危险认知，却仍然穿着高跟鞋，最终导致自己滑倒摔伤，也应负有一定责任。

理清来龙去脉后，调解员把四方当事人聚到一起，从法律层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再次分析。食堂管理人员在张女士出事后表示“自己并不同意”，但在许女士告知找人代班时也并未明确表示拒绝，且当天张女士穿高跟鞋进行作业时，食堂方也未采取相应的制止措施。张女士为该食堂工作期间，应视为张女士与食堂承包公司之间实际建立了临时性的雇佣关系，事故发生在张女士工作过程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在此过程中造成的损害食堂承包公司应承担一定责任，并有权向许女士和单女士进行追偿。

最终，四方达成一致协议。食堂承包方除前期支付张女士所有的治疗费用外，另一次性补偿张女士3300元；许女士和单女士除前期慰问金外再每人一次性补偿张女士1000元。

拿着借条上法院，
为何不能拿到钱？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刘竹柯君 王经展

拿着借条上法院要求被告还钱，却没能如愿拿到钱，这是为何？近日，玉环法院、台州中院就审理了这么一起民间借贷案。

2012年，白某在叶某追求下，与他确立了恋爱关系。不久，她发现叶某已经结婚。叶某表示自己一定会离婚，白某相信了。

2013年9月，叶某在白某准备的借条上签了名字，借条载明“叶某共向白某借款现金30万元”，并注明如果叶某不能够在一年后兑现结婚承诺，必须全款归还。

由于叶某未能兑现承诺，双方对还款也有争议，去年6月，白某将叶某诉至法院，要求其偿还借款30万元。

庭审现场，白某出具了借条、自己的信用卡消费及记录、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十几万是现金交付，其他的钱包括他刷我的信用卡、我给他转账，还有他让我给他朋友转的钱。”

“从转账记录可以看出，白某给叶某转账金额都很小，最多不超过5000，这不符合民间借贷习惯，更像是情侣间周转。”叶某代理人说，“叶某是有用白某的信用卡，但他也给对方买包和香水，双方都有付出。”

为何要在借条上附加结婚承诺？白某表示，自己写借条的原因，就是想让叶某承认借钱了，由于对叶某仍有幻想，所以加了这句话。

“我以为借条只是一个结婚承诺，也打算跟她在一起，就签了字。”叶某说。其代理人补充道，“借条是对婚姻的承诺，并非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

法院审理认为，正常民间借贷出具的借条内容，应与借款事项有关，如说明利息、还款日期等，但本案借条却具有结婚承诺的意思，结合原被告当时的关系及借条内容，被告称“该借条并非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一定合理性。就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及信用卡消费、取现记录等证据，仅显示被告有收到原告小额款项，这更符合情侣之间的赠与，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此外，原告指证其受被告指示向他人汇款应算为被告的借款，被告已当庭否认，故原告在没有其它证据印证下，法院不予认定。

据此，玉环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近日，经台州中院二审，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叶某支付白某5万元，本案就此了结。

原以为捡到了便宜
没想到却是事故车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程辉

原以为自己捡便宜低价买到了一辆二手宝马车，没想到却是事故车。不久前，桐乡的钟先生就碰上了这样一件麻烦事。

为方便出行，钟先生今年2月通过二手车行向沈某买了一辆宝马X6二手车，总计18.3万元，当时口头说好车子未发生过重大事故。

开了一阵子后，7月6日，车子因出现漏水及电路故障被送修。期间，钟先生查询第三方验车平台才发现，汽车A柱竟然有过拆装！“修理师傅说如果不是事故车，不可能去去拆装汽车A柱。”钟先生认为沈某有意隐瞒了车况，涉事的宝马车发生过较大事故，要求退车。在与原车主沈某和二手车行多次交涉无果后，10月21日，钟先生向桐乡市消保委求助。

消保委介入后，立即联系各方调解。经工作人员耐心释法说理，最终各方自愿达成协议：考虑到汽车使用折损，由被诉人沈某以16.1万元回购该车辆，车辆保险归沈某；车辆维修费用1.4万元由被诉人沈某承担，待车辆过户时，车款一次性付给投诉人钟先生。

消保委提醒，消费者在购买二手车时，一定要签订合同，要特别注意合同中的相关条款，如对“事故车”的事故范围进行约定等，以保障自身权益。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